

百年来《孔府档案》整理的艰难历程

吴佩林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孔府档案》是指今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保存的孔氏家族在明代至民国时期对内、对外活动中形成的文书档案,价值极高,有“西有敦煌文书,东有孔府档案”之誉。《孔府档案》的整理,从1922年算起,迄今已近百年,大致经过了六个阶段;每一阶段几乎都与一些重要历史节点有关,可谓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化部、山东省委宣传部等重要部门的重视,显示出与一般地方文献不一样的特征;得益于一批管理部门、出版社和专家学者的指导,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尽管如此,限于经费、人力、技术、观念等原因,整理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曲折,整理与出版成果也不及清代州县衙门档案和民间文书,由此使得学界对它的研究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加强孔府档案的整理与出版乃大势所趋,相关部门当解放思想,顺势而为。

关键词:孔府档案;整理;百年回顾

中图分类号:G275.1;G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20)05-0033-09

《孔府档案》是指今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保存的孔氏家族在明代至民国时期对内、对外活动中形成的文书档案。孔府,又称圣府,其主人是孔子嫡系后裔,历代统治者因尊崇孔子而对其后裔“恩渥备加”“代增隆重”,逐渐形成了世袭罔替的“天下第一家”。“夫帝王之姓有时无,定鼎之区有时而改,独孔子

之阙里则与天长存”^①,由于政治地位的稳定性,《孔府档案》得以产生并保存下来。

《孔府档案》具有历时时间长^②、数量多^③、形式独特^④、涉及地域广^⑤等特征,这对于理解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特别是明清时期、由清至民国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

收稿日期:2020-0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孔府档案文献集成与研究及全文数据库建设”(13&ZD108)

作者简介:吴佩林,男,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孔府档案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 ① (清)刘芳躅:《〈阙里广志〉序》,(清)宋际、宋庆长:《阙里广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0册,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1996年,第228页。
- ② 目前公认的孔府档案起止时间为明嘉靖十三年(1534)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历时414年,包括明、清、民国三个时期。即最早的一件是第16卷《吏部为孔公铉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司学录事》,时间为嘉靖十三年(1534)六月初四日;最晚的一件是第8978卷《一九四八年一至六月收入款项流水账簿》。而事实上,孔府档案第6、7卷保存了成化年间修刊的孔氏宗谱,其刊布时间当早于1534年。
- ③ 据不完全统计,孔府档案现存9021卷,其中明代62卷,清代6538卷,民国2421卷,约25万件。另有散档,约2万件/套。
- ④ 孔府档案不同于徽州文书、石仓契约这类的民间文书,也不同于《巴县档案》《南部档案》《淡新档案》这类纯粹的衙门档案。它作为一个贵族地主的私家档案,其中保存了大量衍圣公府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文书,使其又具有官方档案的性质。
- ⑤ 通常情况下,州县衙门档案的主体文书一般局限在本县,而孔府档案涉及的地域包括鲁、冀、豫、苏、皖5省20多个州县。

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价值,可以用“西有敦煌文书,东有孔府档案”来概括。然敦煌文书早已成为国际显学,而《孔府档案》长期以来受整理与开放程度的制约,还只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巨大宝库。本文拟以相关发表成果^①和访谈^②为基础,系统梳理1922年以来的整理^③史,希望能明了百年来的整理得失并有益于《孔府档案》整理与出版工作的推进。

一、20世纪20年代的清理

据曾任清末孔府典籍官的孔昭培^④老人回忆,孔府曾于1922年对档案进行一次集中清理^⑤。从现存《孔府档案》第8117—8127卷来看,当时共清理出档案5445宗,时间集中在清顺治三年(1646)到民国十一年(1922),对明代档案只清理了个别卷宗,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第一阶段的档案清理情况统计表

号别	类别	数量(宗)	档案卷宗号
天字号	林庙卷	273	8117
地字号	祀田类	364	8118
元字号	承袭暨官俸、 崇圣典例类	20	8119
黄字号	属员卷	1970	8120、8121

宇字号	各奉祀官杂案, 学堂岗案附	236	8122
宙字号	各庄小甲集纪	267	8123
洪字号	各项杂案	1688	8124—8126
荒字号	修谱免差卷	627	8127

从现存案卷来看,此次整理只是对档案数量做了一个初步的清理工作,并不彻底,像黑木柜橱顶上的档案就没有动过^[1],每个“号别”内的案卷也并非按时间先后排列。

尽管如此,这次清理的意义不容小觑——它使我们摸清了《孔府档案》的编排与归档方法——“千文架阁法”,即以千字文开头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总分为八大类^⑥,各类再根据孔府自身的特点分别归档。如上表所示,“林庙”档案归“天”字号,“祀田”档案归“地”字号,如此等等^⑦。对于这种归档原则,孔昭培给单士元的信中也提到,称这是“旧时规程”^[2](P339—345)。这与我们看到的清代州县衙门档案“按房归档”的原则大为不同,如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按吏、户、礼、兵、刑、工、盐、承发等八房归档,巴县档案按吏、户、礼、兵、刑、工、盐、仓、柬、承发等十房归档。

孔府此次的档案清理一方面是配合当时的祭田

① 主要包括单士元:《曲阜孔府档案初步清理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单士元:《我在故宫七十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1—345页;骆承烈:《向老与孔府档案》,编委会编:《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56—759页;杨向奎述,李尚英整理:《杨向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7—107页;刘守华:《孔府档案抢救记》,《档案春秋》2009年第7期;单嘉筠:《单士元、任继愈先生与孔府档案保护》,《中国档案》2010年第7期;骆承烈:《洙泗归元》上册,香港:中国孔子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89—102页;孔德平、唐丽:《孔府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邱源媛:《专访郭松义教授:在时代的风雨中且行且进》,载于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通讯》2018年第67期,2018年3月,访问地址: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635。

② 笔者曾就当年档案的整理情况多次请教郭松义、骆承烈、孔祥林、孔德平四位先生,以及第二历史档案馆、曲阜市孔子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光明日报社记者杜羽也提供了不少帮助,谨致谢忱。

③ 本文所论整理系泛指,也包括档案的清理。

④ 孔昭培,曾用名刘昭培,因孔府规定凡进府服役的孔姓人,不许姓孔,故随姥姥家改用了刘姓。

⑤ 单士元:《曲阜孔府档案初步清理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另作者在《抢救山东曲阜孔府历史档案记》一文中,将此时间记为1919年(见单士元:《我在故宫七十年》,第337页)。

⑥ 第三类“玄”字在《孔府档案》中记为“元”字,当是避讳所致。

⑦ 从民国十二年(1923)起,孔府档案的登记没有按上面八字归档登记,而是采取的“新”字号编排,登记到民国十五年(1926),共254号(《孔府档案》8128卷)。

清理,另一方面可能与“八千麻袋”事件有关。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将原存于国子监和学部,后搬迁至午门与端门洞口中的共15万斤档案,约“八千麻袋”,以4000元的价格卖给了西单大街同懋增纸店。纸店打算将这些档案送到定兴、唐山两处造纸厂化浆造纸。罗振玉获悉后,于1922年2月,用12000元把它买了回来。这就是档案界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随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这批档案陆续展开了整理和研究,开创了明清史研究的新纪元。

二、20世纪50年代的整理

1948年曲阜解放,曲阜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孔府全部财产和工作人员,并成立孔府文物保护所,对孔府文物实行原地保护。工作人员在清理库房时发现,《孔府档案》多集中堆放于册房,但也有大量档案散存在“六厅”、司房、启事厅以及民国时期的承启处、庶务室等处^[3],不过当时并未对这批档案进行整理,甚至一度曾打算当废纸卖给造纸厂^[5](P90)。

1956年,郑振铎由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荣任文化部副部长,上任不久便从书贩韩世保处得知,近两年在安徽徽州地区“土改”中,抄家抄出了大量的古籍。这些古籍流散和破坏得很厉害,许多被用来烧火、做鞭炮、造纸、包东西,有的村庄将这些古籍烧毁,三天三夜都没有烧完。后经他干预,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支持下,徽州文书得以保存下来^[4]。同在1956年,对《孔府档案》有过一次成效显著的抢救性整理当受此类事件影响,事实上也与郑振铎有关。

(一)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派人清理(1956.6—7)

1956年春,文化部文物管理局获悉,孔府内的文物档案正遭孔氏宗族中不肖者偷盗,他们将这些文物档案已经运到当时的滋阳渡口,正在私下倒卖,情况十分严重。虽然当地政府采取措施截回了一部分,但这些档案杂乱不堪,需要行家指导整理。于是当地政府向中央政府请求帮助,希望能够派专家前去协助。当时文物管理局领导郑振铎、王冶秋决定

派故宫博物院专家单士元、李鸿庆前往曲阜^①。6月18日,单、李二人从北京出发,次日到达济南后马上与省文物局取得联系。20日由济南转车南下,当日下午到兖州,过滋阳渡口抵达曲阜县文物保管所。

据单士元回忆,衍圣公三堂的前院原为旧日典籍房,档案库就在西配房里。在靠墙的地方,有下丰上锐的明代黑漆大柜。柜里面由于塞满了陈年旧卷,其柜腿已被压陷于地下寸许,柜橱后档案也是堆积成山。其库藏情景,仿佛20年代初次进入清宫内阁大库一般。在内宅后堂楼上堆积了大批的地契存根,楼下还有大席包盛装的档案,这是后来移存在这里的^[2](P333)。

单士元等人到达的第二天,便与当地保管所同志以及孔昭培老人一起,按柜橱的顺序进行清理。首先除尘、折叠、包扎,根据“原包原捆,秤不离砣”的原则,清理集中,一张包皮也不遗弃,更不使一张文件档页挪移失群。有些在几十年前就已霉烂成砖块粘在一起的档案,暂放另一处,俟有妥善办法时再进行揭开整理。这样的工作做了四天,并随时分类。随后在新选择的后佛堂楼下新档库房排好橱柜,分类度藏^[1]。

这次初步抢救成效明显,使那些重要的档案不再继续损失和毁灭,更重要的是,通过抢救性整理,提高了保管人员的认识,引起各方人士对这批档案的重视。回京后,单士元等立即撰写了“抢救曲阜孔府档案报告”。此报告对《孔府档案》的现状非常担忧,特别强调了抢救工作的重要性,“如果不作这次抢救工作,一二年后,它的后果,将是一堆泥块和纸灰,那真是不可补偿的损失了”。同时他还在报告中建议,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这批档案进行长期的系统化整理,并尽快培养管理档案的干部。报告上呈王冶秋审阅,王阅后批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既生动又具体,我的意见最好在文化部内部刊物登载一下,以引各地保管所有类似情形者可以重视。”之后郑振铎也做了眉批:“可择要在通讯上发表”等语^[6]。

(二)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的整理(1956.8—1958.9)

文化部文物局的专家们走后,曲阜县文物保管所又继续对《孔府档案》进行整理,将档案分存于后

^① 骆承烈:《洙泗归元》上册,第90页;刘守华:《孔府档案抢救记》,《档案春秋》2009年第7期。

五间房,单独列项,专库保管,以便以后进一步整理。1956年8月开始,文化部文物局委托国家档案局,派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家常驻曲阜进行分类整理,由金佳任组长,成员有郭鹏、丁家襄,参加整理的还有南京装裱工程先道。

驻曲期间,专家组与曲阜县文管所工作人员一起,对原先处于杂乱堆放和散存状态的《孔府档案》进行了除尘、鉴定、分类、立卷、排序、编目、编号、裱糊、装订成卷等整理和保护工作,并将所存档案分为若干大类。此次整理至1958年9月结束,经整理后的档案按时间顺序分为明代、清代、民国三个时期^①。明代档案从明嘉靖十三年(1534)^②至崇祯十七年(1644),分为袭封、宗族、属员、徭役、刑讼、租税、宫廷、灾异、资料文书9类;清代档案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分为袭封、宗族、属员、刑讼、租税、林庙管理、祀典、宫廷、朝廷政治、财务、文书、庶务12类;民国档案分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1928—1934)、国民党时期(1935—1937)、敌伪统治时期、曲阜解放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每个时期分类多寡不一,分别为11、10、9、9、3、8类。此次整理使《孔府档案》首次得到了系统的案卷级整理,单独列项、专库保管、装箱保护,建立了完整的案卷级目录体系,奠定了有序典藏管理的基础^③。1959年夏季至国庆节,由于孔府要进行复原陈列,故将档案由后五间房迁移至东大楼下保管,并批拨50方香樟木,制成档案箱保护^{[7](P537)}。

三、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整理

60年代初期,对《孔府档案》的整理,有两支队伍同时进行。

(一) 曲阜县文物保管所对《孔府档案》的整理

1960年春,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到曲阜检查档

案工作,专门对《孔府档案》的整理工作作出指示:“要片纸不丢,只字不损,把档案保护下来。”这以后,曲阜文管所又加强了人力进行裱糊装订,其中长期参与整理的是孔昭培、颜世镛和装裱工崔老先生。至1965年,共整理出案卷8983卷。1966年“文革”开始后,整理工作被迫停止^④。

这一时期,曲阜文管所还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不仅对明代《孔府档案》(第60卷除外)做了案卷级的著录和标引,形成了案卷目录,而且还为卷内每份文件撰写了“卷内目录”。该目录包括作者、内容摘要、文件上的日期等要素。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也算是比较规范的整理,而上个世纪《巴县档案》《宝坻档案》的整理也不过只做到了案卷级的著录。

(二) 中国科学院对《孔府档案》的整理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所的参与,《孔府档案》的整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63年春,中国科学院为开发和利用《孔府档案》,决定由封建后期史研究组组长杨向奎负责,与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59年6月,“曲阜县文物保管所”改为此名)、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合作选编《孔府档案》。杨向奎先给曲阜师范学院骆承烈写信联系,告诉他暑假期间再去曲阜,请他组织一些学生,以备抄录档案。骆承烈接到信后,经与历史系商议,最后从历史系和中文系高年级中挑选了二十几个水平高、态度认真、字迹规整的学生。同年7月,在山东省委宣传部热情关心和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积极支持下,杨向奎教授带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重日、胡一雅、钟遵先、张兆麟、何龄修、郭松义、张显清七人,来到曲阜一同与曲阜师院历史系的骆承烈、郭克煜、孔令彬组成十人的业务班子,在曲阜文管会的帮助下,由杨向奎全面领导,开始了较大规模的选录工作。

① 据孔昭培称,这两年间,档案的整理曾停止过(单士元:《我在故宫七十年》,第339页)。

② 在此次整理过程中,专家们对孔府档案的起始时间形成了比较公认的观点,即本文前言提到的嘉靖十三年(1534),该观点后来被广泛接受。

③ 以上参见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23、559—560页;孔繁银:《曲阜的历史名人与文物》,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537页;孔德平、唐丽:《孔府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张开森、孙骊君:《二史馆专家组赴曲阜指导孔府档案整理工作》, <http://www.chinaarchives.cn/news/china/2017/1018/117813.shtml>,访问日期:2020年4月5日。

④ 骆承烈:《洙泗归元》上册,第90—91页;孔繁银:《曲阜的历史名人与文物》,第537页。

由于档案数量大,由杨向奎确定了选录原则:明代档案全抄;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档案重点选抄,之后的适当选抄;民国时的档案不要。刚开始时,杨向奎亲自到库房选取,并就不同类型的档案拟了一些题目。之后,在杨向奎的指挥下,两三个人深入档案库房,挑选有代表性的案卷,卷内选出典型的文件,选出后交给学生复写抄录。抄录后,经骆承烈等几位对档案比较了解的老师进行校对、标点和拟题,最后由杨向奎过目定稿。实际上,每份档案原来都有一个题目,但大多比较笼统,因而在拟题方面要求新拟的题目既要确切、精炼,不能打破古时公文书式的文风,还要体现出这份文件的特点。

经过一个多月大规模的抄录和两个多月的整理,最后共抄录档案 4 353 件,整理档案计五六百万字。随后,他们在每篇中都用标点符号断句,篇前题名,篇后附有原标题和卷数。明代档案因内容较少,单列一部分。清代档案分为孔氏宗族、圣贤后裔、公府组织和职掌、公府田产、租税、集市、商业高利贷、刑讼、抗租与抗差斗争、农民起义与反抗活动等。同时,此次整理也培养了一批学生,如 1964 年,在历史系毕业的一个班中,就有傅崇兰、朱东安、张道英、张传恭等四人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创曲阜师范学院历史上的最高纪录^①。

四、文革期间的整理

1966 年 5 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孔孟之道成为批判重点。在当时背景下,红卫兵将《孔府档案》中的资料称作“变天账”,被当作封建糟粕而大加批判。在这一形势下,中国科学院对《孔府档案》的后续整理被迫中止。这一时期,《孔府档案》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损失严重。1967 年 2 月,处理了孔氏族谱(包括明清底稿抄本)10 778.5 斤,共计 209 套,32 232 册,整整装了 8 马车,全部卖到造纸厂毁掉,

售款 269.46 元^{[8](P212)}。档案丢失 28 卷^{[8](P250)}。

据孔子研究院原副院长孔祥林回忆:1972 年,有人以“人民”来信反映泰山文物受到严重破坏,周恩来总理批示给杨得志、袁升平,要山东派得力人员到泰山、曲阜调查文物破坏情况。周总理接到调查报告后特批 125 000 元,用来维修大成殿,扶立推倒的石碑等。此次《孔府档案》的整理应该与此有关。这一年,《孔府档案》整理工作重新恢复,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建立了新的登记册,并全部归类编号,上架入箱,存用两便。至 1987 年,共整理出案卷 9 021 卷,并完成全宗目录索引编制工作^②。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出于批孔的需要,曲阜文管会对《孔府档案》每个案卷作了进一步整理,摸清了卷内的文件数量,并填写了考证表(但没有像明代档案那样填写“卷内目录”单)。从这些考证表可知,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 1977 年年底。期间,山东大学历史系与曲阜县文管会合作,还选录了一批近现代档案资料。

五、改革开放后至 2016 年之间的整理与出版

(一)《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的出版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在国家古籍整理等一系列政策引导下,这些卷帙浩繁的档案再一次进入全面科学整理与研究的新时期,重新回归大众视野。据骆承烈回忆,十五年前整理的资料共有三份复写本。文革时期,他将包括手中的一份复写本在内的文物封在十四个大箱子里完好无损。文革后,三份资料仅剩曲阜师范学院保存的一份。1979 年,骆承烈等人向杨向奎教授建议将这批资料出版,得到同意与支持^{[5](P93)}。不久,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由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大

① 以上内容参引杨向奎述,李尚英整理:《杨向奎学述》,第 97 - 107 页;骆承烈:《向老与孔府档案》,编委会编:《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第 757 - 758 页;邱源媛:《专访郭松义教授:在时代的风雨中且行且进》,载于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通讯》2018 年第 67 期。

② 参见孔德平、唐丽:《孔府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该文所说完成了卷内目录 62 卷有误,这个是在 1962 年完成的,而不是 1972 年;孟继新主编:《孔府档案珍藏》上册,“绪言”,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 1 - 2 页。

学、曲阜师范学院、山东省文化局、山东省出版局等有关单位联合组成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编辑委员会,组织各单位专业人员成立编辑部,对当年选抄的档案资料进行统一校点,进一步加工整理。后经过多次修改,审订成书,取名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该书共分3编,500余万字。第一编为《全宗类目索引》,计2册;第二编为《明代档案史料》,全1册;第三编为《清代档案史料》,计21册。合计24册,于1980—1985年由齐鲁书社陆续出版^①。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是迄今为止出版的《孔府档案》中规模最大的资料选编。出版后,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1980年代以来,日本斯文会代表团、道德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谱系学”代表团、美国档案馆、博物馆代表团,墨西哥国家档案代表团曾先后前来曲阜参观《孔府档案》[3]。

(二)任继愈对保存和利用《孔府档案》的呼吁

1982年6月上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到山东曲阜查阅《孔府档案》时发现这批档案有损毁。7月1日,他便直接写信向中央主管文化文物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反映情况,信中写到:“六月上旬,因工作需要,到曲阜孔府查阅有关档案,收获不少。根据见闻,提出关于妥善保存和充分利用孔府档案的建议四条(见另纸)。”任继愈的建议指出:

这批档案材料不仅详尽地记录了孔府的历史沿革,同时也反映了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整个社会状况。由于它是连续几百年记录下来的第一手材料,其史料价值极高,是我国文化的一个宝藏,如果能为学术界充分利用,深入发掘,必定会大大丰富和加深我们对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社会的认

识,必将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更广泛的重视。

任继愈还进一步指出,曲阜孔府作为儒教圣地,其地位相当于基督教的耶路撒冷。因此,应当对《孔府档案》进行缩微,以保护原稿、预防天灾人祸不测事,也能为研究者后续的查阅利用提供方便。假如我们这一代未能充分保护,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后果是严重的。这些建议很具有前瞻性。

很快,胡乔木就将任继愈的建议转发给时任中共中央宣部部长邓力群同志,同时附上了重要批示:

任继愈同志信件请阅。他的意见很值得重视,请考虑可否由中宣部专函山东省委宣传部酌办。这些事情一向无人注意,拖欠了必致损失。又档案缩微事业关系我国文化遗产的保存,意义很大,并希告图书馆局、文物局和档案局一并从速进行为荷。

邓力群接示后也作了“转发有关单位,分别商定执行办法,请张丹同志和有关局负责”的批示。不久,全国图书馆档案馆等收藏文献档册史籍等单位,都逐步建立了缩微复制的专门部门,以从事对历史档案文献进行有效的再生性保护抢救工作^②。据孔祥林回忆,山东省为落实此项工作,当时花了40万元买了一套缩微设备,但此设备却没放在曲阜,而是放在了省图书馆。那时没有密封车,交通条件又不好,去济南全是县乡公路,担心路上出安全事故,又考虑到缩微时还得拆卷,此事就此搁置,没能做成。而这一时期,四川的《巴县档案》、河北的《宝坻档案》等一批档案都做了缩微胶片。

(三)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孔府档案》的整理

在这一时期,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先前整理的基础上又陆续开展了一些工作。1992年开始整理、抢救裱糊部分残破散档,至今共整理出3.6万余件。2013年9月开始,通过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

① 杨向奎:《前言》,张维华主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二编《明代档案史料》,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2页;骆承烈:《洙泗归元》上册,第93页。1988年,该资料作为孔子文化大全的一部分,以《孔府档案史料选》为名在山东友谊出版社再版。

② 以上内容参见冯乐耘:《谈谈档案的“寿命”》,中国档案学会编:《全国第二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236页;单嘉筠:《单士元、任继愈先生与孔府档案保护》,《中国档案》2010年第7期;杜羽:《国家典籍幸——记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2日,第9版。原始引文根据2019年9月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陈展图片以及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秘书处撰写的《追忆任继愈先生为我国珍贵文献的保护和缩微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数字与缩微影像》2009年第3期)一文所附图片整理而成。

普查,曲阜文物部门对馆藏《孔府档案》进行了全面梳理,完成了9 021卷、25.8万余件《孔府档案》数据的采集、登录工作。2015年4月,曲阜市文物局启动孔府散档整理修复工作,分14个类别,通过编目整理、托裱修复、信息采集录入、汇编成卷归档,对“一普”中发现的散档进行系统整理,到2016年已整理修复散档8 700余件^①。

(四) 其它出版品

这一时期,除了出版24册《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外,还陆续出版了以下选编资料。

1.《孔府档案选编》(中华书局)^②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包括孔府(“衍圣公府”)的由来及其特权、孔府的土地与户人、孔府的地租剥削、孔府的其他剥削、孔府的腐朽生活、农民起义对孔府的冲击和孔府佃户的抗租抗差斗争、孔府的没落与覆亡,共七章。该书以《孔府档案》为主,所编档案除已整理的部分外,还选用了部分散档和相关传世文献、碑文资料。

2.《孔府档案选》(中国文史出版社)^[9]

鉴于《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以及《孔府档案选编》所选内容只限于明、清,无民国,2002年,骆承烈等利用文革期间庞朴、葛懋春、朱玉湘、官美蝶、罗伦、景甦、路遥、李启谦等人所收集的档案,按孔府与历代官府、孔府的政治特权、孔府的经济特权、孔府的意识形态、孔府的生活、各种反抗斗争等六目选编了《孔府档案》300余件,最终以《孔府档案选》为名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附录了“孔府档案分类简目”,它以明代、清代、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上)、国民党时期(下)、敌(日)伪统治时期、曲阜解放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分八目,每目下又分袭封、宗族、属员若干,之下又细分若干小目并标注各卷起止,如清代“刑讼”目下为:孔氏族人(6721—6724)、府庙员役(6725—6726)、庙佃户人(6727—6730)。此简目有助于读者了解和查找档案的内容。

3.《孔府档案珍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

2009年,山东济宁市为加强本地文化名城建设,推出了《济宁历史文化丛书》,《孔府档案珍藏》是其中一种。该书分孔府与朝廷及官府的关系、孔府的属官与员役、孔庙孔林的管理、孔府的各项消费和开支、孔府的生活写照、孔氏家族及族规家训、孔子世家谱的续修、给圣裔的特权和优礼、孔继汾案始末、圣贤后裔、孔府的庙户佃户、孔府的田产及其来源、孔庙祭祀及皇帝曲阜朝圣等十三章,共选取了孔府档案、孔府散档273卷(件)。

这些资料的选编出版,对于了解《孔府档案》的内容与价值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些出版资料多有遗憾,如选录数量少,选录某一卷的内容不完整,部分标点、文字识别有误等。这些都限制了学界对《孔府档案》的利用与研究。

六、2016年至今的整理与出版

2013年11月,由曲阜师范大学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孔府档案文献集成与研究及全文数据库建设”获批立项。同年12月,曲阜师范大学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合作整理孔府档案协议书》,这标志着《孔府档案》的整理与研究进入了数据库建设的新阶段。不过,两个单位实质性的合作直到2016年8月才正式开始。在这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但由于孔府档案多年未对外开放,一些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是否合作、怎样合作顾虑较多。为达成合作,使档案整理与研究得以顺利实施,曲阜师范大学不断与曲阜市有关部门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协调,并承诺拿出专项资金以完成库存25万件档案的数字化加工。在此情况下,曲阜市文物局的主要领导力排众议,安排专人负责与曲阜师范大学合作进行档案的

^① 孔德平、唐丽:《孔府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另据2020年4月10日《中国文物报》的记载,目前已整理孔府档案散档19 860件(套),36 429件。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孔府档案选编》(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孙健、孔繁银主编:《孙健文集》第五卷《孔府档案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数字化加工工作。

之后的一年半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多次派出专家,围绕在整理编纂《孔府档案》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对曲阜市孔子文物档案馆、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从事《孔府档案》整理编辑工作的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实践指导,保证了整理质量。到2018年,成效显著:(一)图片采集采取最新技术,完成了9000余卷近30万件共94万画幅的档案彩色扫描工作;(二)完成了所有明代、民国档案以及部分清代档案的著录工作,每案有卷名,卷下各件的责任者、题名、时间、受文者、文种等基本要素齐备;(三)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明代卷》(全三册附录一册)。

在这期间,《孔府档案》的整理受到国家及山东省的高度重视。2017年7月17日,文化部印发关于加强《孔府档案》保护整理和出版情况的报告上报中央,得到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批示和圈阅,要求将《孔府档案》的保护、整理与利用作为国家战略工程,延揽凝聚优秀团队和学术力量,高水平开展整理研究,使其宝贵价值得到充分发掘和彰显。2019年6月1日,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求是》刊发署名文章《以高度文化自信守护中华民族文化根脉》,明确指出,为了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山东省需要实施学术研究工程,推进包括“孔府档案学”研究在内的三大重要基础工程。同年,山东省委宣传部在“山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基因传承发展工程项目”中专列“孔府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支持曲阜师范大学推进这一工作。

这一阶段的整理,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整理规范上,在国内都属领跑者。不过,从2018年暑假开始,由于曲阜市文物局文物搬迁、孔子博物馆筹备开馆以及其他原因,《孔府档案》的整理再一次停止。至此,原拟于2021年前影印出版2000册全套《孔府档案》的计划也势必延拖了。

结语

回顾百年来的《孔府档案》整理,既有可喜成果,

又充满了艰辛与曲折。若以史为镜,其中损益,至少有四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六个阶段中,实质性的档案整理不多。严格意义上讲,档案整理是指按照一定原则对档案实体进行系统分类、组合、排列、编号和基本编目,使之有序化的过程。而细观六个阶段的整理,第一阶段只能算是数量上的清理;第二阶段国家文物局派单士元等人到曲阜对《孔府档案》展开的为期一周的除尘、折叠、包扎、分类工作,也算不上实质性的整理;第三阶段中,中国科学院对《孔府档案》的整理所做的工作是档案摘抄,不涉及档案的编号、编目等整理环节。真正算得上档案整理的主要有第二阶段南京档案整理处的整理、曲阜文管所在此之后历次按整理规范进行的档案整理、第六阶段曲阜市文物局与曲阜师范大学合作开展的整理。客观而言,每个阶段皆有其贡献,但也有其缺陷与问题。

第二,百年来,《孔府档案》的整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化部、山东省委宣传部等重要部门的重视,显示出它与一般地方文献所不一样的特征。不仅如此,档案的整理还得到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部门,以及单士元、杨向奎、任继愈、郭松义等一批专家学者的指导,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如“原包原捆,秤不离砣”,“片纸不丢,只字不损”,“以案卷为单位,按‘件’整理”,“文件题名撰写基本要素须完备”,“原色影印出版”,这对于其它档案的保存、整理和出版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整理充满了艰辛与曲折。一方面,几乎每一次整理都与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相关,比如第二阶段的整理与1950年土地改革有关,第四阶段的整理与文革时期批林批孔有关;另一方面,整理不尽人意。《孔府档案》的数量,加上散档,不过30万件左右,但整理却花了近百年的时间,期间基于经费、人力、技术、人祸(文革)等不同的原因,走走停停,特别是在2018年之后,在技术、人力、经费等各方面都成熟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国家大力倡导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大趋势下,孔子博物馆^①与曲阜师范大学的合作时续时断,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第四,加强《孔府档案》的整理、出版势在必行,相关部门当解放思想,顺势而为。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时至今日,清代南部档案、巴县档案、冕宁档案等一大批衙门档案已全部或陆续出版,大量的民间文献,如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也呈井喷式的刊布,并由此推出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而《孔府档案》的研究之所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它的不出版、不开放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郭松义教授曾不止一次地感叹:“孔府档案的内容实在丰富,冷落它真是可惜!”

参考文献:

[1] 单士元.曲阜孔府档案初步清理记[J].文物参考资料,1956,(10).

- [2] 单士元.我在故宫七十年[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3] 徐玉英,庞秀芝.孔府档案的由来、整理及其历史价值[J].济南大学学报,1999,(1).
- [4] 王国键.徽州文书发现的来龙去脉[J].中国档案,2005,(7).
- [5] 骆承烈.洙泗归元(上册)[M].香港:中国孔子文化出版社,2015.
- [6] 刘守华.孔府档案抢救记[J].档案春秋,2009,(7).
- [7] 孔繁银.曲阜的历史名人与文物[M].济南:齐鲁书社,2002.
- [8] 刘亚伟,王良.1966 阙里纪事[M].曲阜:曲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内部交流本,2015.
- [9] 骆承烈,等.孔府档案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 [10] 孟继新.孔府档案珍藏[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李观澜

The Difficult Centennial Collation of the Kong Family Mansion Archives

WU Pei-l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Preserved in the Confucius Museum in Qufu, Shandong province, the *Kong Family Mansion Archives* refers to the documents and archives of the Kongs in history especially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valuable, known as “Dunhuang Documents in the West and Kong Family Mansion Archives in the East”. It has been nearly a hundred years with six stages since 1922. Almost each stage relates to some important events in its centennial collation, which is a microcosm of modern China. Being different from local documents, it has be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by the leader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Shandong. Some important experiences have been gained due to the guidance of experts, scholars,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the publishing houses. Due to lack of funds, human resource, technology, and ideas, its collation is difficult and its sorting and publishing are not as good as the archives and folk documents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which has led to a low level in academia. It is the general trend to strengthen its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an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emancipate their minds and follow the trend.

Key words: Kong Family Mansion Archives; collation; centennial review

^① 曲阜市孔子博物馆的前身是孔子博物院,孔子博物院即是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以历史渊源比较久。现在的孔子博物馆,2016年9月设立(隶属于曲阜市文物局,2018年1月后隶属于山东省文物局和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2018年11月26日建成试运行,2019年9月6日正式开馆。先前,孔府档案一直属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孔子博物院)管理,孔子博物馆设立后,孔府文物档案馆整体划入孔子博物馆,孔府档案自然也一同归入孔子博物馆管理。